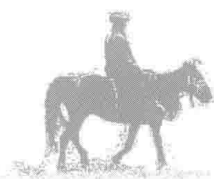




游牧美学 与**现代品格**： 社会转型期的蒙古族小说

丁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游牧美学 与**现代品格：** 社会转型期的蒙古族小说

丁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牧美学与现代品格：社会转型期的蒙古族小说/丁琪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161-8807-1

I. ①游… II. ①丁… III. ①蒙古族—小说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514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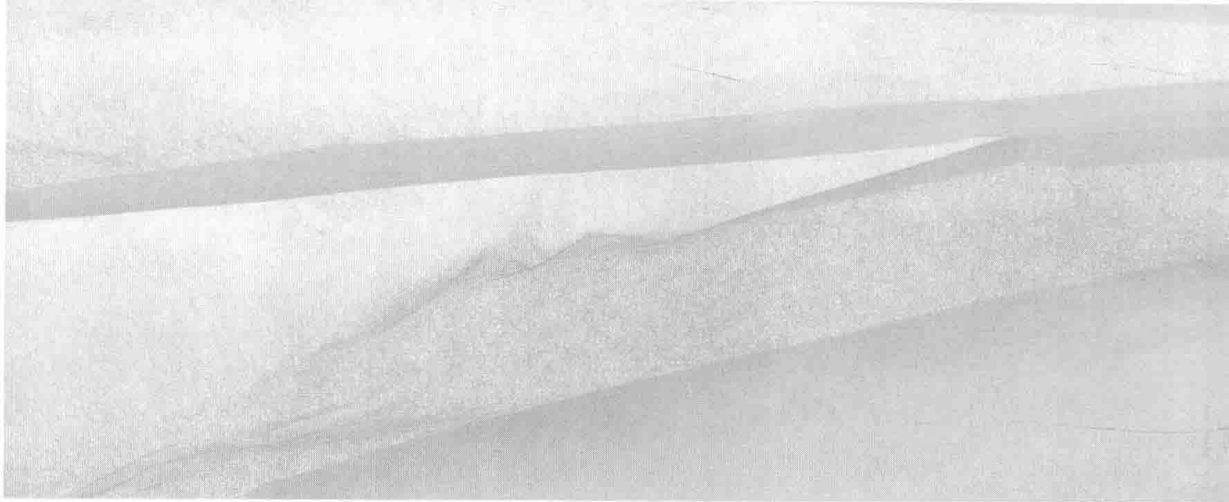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新时期蒙古族小说民族认同与文化思想研究(批准号11XZW039)”成果。

前 言

新时期是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民族化意识同时觉醒的重要阶段。中国主流文学的华夏边缘叙事为身处地理与文化双重边缘的少数族裔作家自我中心化提供了启示和契机，激发了他们的族别身份意识以及自主的文化表达诉求。此时崛起于文坛的蒙古族中青年作家阿云嘎、白雪林、甫澜涛、佳峻、郭雪波、满都麦、察森敖拉、哈斯乌拉等，以文学创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创造了中国文坛别具游牧民族风情的文学版图，将迁徙族群的生存经验上升到哲学思辨和审美层次，从而对草原游牧民族稳定的文化结构和族性心理进行深入省思和审美表现，彰显了民族认同的文化思想特质。

社会转型期的蒙古族作家是在“以民族特色走向世界”的时代文化诉求中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又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剧引发的民族文化遗产危机中体验到挫折的。这使得他们的民族认同不可能是简单的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依附和精神回归，而总是在对现代性的卷入、反思、批判中逐渐形成和不断深化。针对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化的激烈碰撞，民族认同的文化立场也有依附传统与主张民族自我现代化的多元化倾向，多样化小说类型由此产生。

蒙古族文化寻根小说以民族辉煌的历史记忆和族源神话传说等文学文化资源重构诗意的北方游牧民族，以抵御现代发展主义的工



业神话。古老的游牧文明特别开阔的想象空间，让作家可以尽情追踪展现蒙古族的传统美德和深厚文化积淀。但是这种艰难的文化寻根行动注定在遭遇挫折体验后才能完成华丽转身，引导小说由一般的诗意想象走向民族心理和情感层面的深描。草原、戈壁、沙漠中那些传统牧民、跟不上时代的“落伍者”及“没有商品意识”的悲剧人物为作品注入了深沉的悲剧内涵。这类小说的民族认同意识最为强烈，从某种角度建构了典型性游牧美学，在从民族视角反思现代性的道路上走得很远。

草原生态小说是文化寻根小说在新时代的变体，蒙古族地处华夏边缘的恶劣生存环境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文化中亲近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天然文化因子。蒙古族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自然环境恶化及精神世界的污染，促使这种古老的生态文明在文学中复活。生态小说对自然的诗意化和神力描写充满文化隐喻，《大漠狼孩》《银狐》等动物题材小说突出动物的“荒野精神”和“通灵者”的角色特征，传达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立场。这些生态小说以游牧之地寄寓了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对古老民族的生态思想进行了现代诠释和文学转化。

面对现代化浪潮中民族性与地方性衰微的现实，有些作家表达了开放的文化态度和不同思路，认为排斥“异端”和感叹遗失都是非理性选择，与其被现代化覆盖，不如主动搭上现代化列车寻求未来的进路。这就包括吸收现代文明的种种新因素将之凝聚为一种现代民族独特性。这类小说对专业知识和科技文明充满美好期冀和想象，并塑造了一批混合着商人身份和民族英雄人格特征的商业精英，尤为重要的是清理了传统封建思想和落后宗教信仰在蒙古高原的凝滞，表达了一种开拓进取精神和拥抱新生事物的积极态度。现代性



与世界性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愿望和期许，在这类文学想象中仍是一种未完成形态，民族文化的现代品格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积极意义是以开放的文化意识对民族现代化问题最早给予了正面回应，为蒙古族小说打开了一个可能的叙事空间。跨族叙事是对族际交流的文学再现，在中华多民族间及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交往想象中交织着民族、国家、身份、文化等多重内涵，它对少数族裔文学摆脱单边思维、最大程度与他民族有效交往沟通、实现文学价值最大化有重要意义。蒙古族跨族叙事最擅长以“拟血缘”方式模拟同胞手足之情或父母子女之爱来建构蒙汉互动的情境与跨族成长故事，以隐喻中华多民族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文化亲缘关系。作者特别强调汉人在草原的成长，蒙古族往往被想象成养育者、施恩者、影响者的角色，而汉族是成长者、回报者、受影响者，尤其是“草原——母亲”的隐喻被不断重复和强化以突出蒙古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海纳百川的气派。族际通婚这种基于身体与情感结合进而实现民族混血与文化交流的行为进入文学表现领域，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跨族婚恋叙事。它往往以爱情、婚姻为表层故事结构，内在诉诸民族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主题。蒙古族小说继承了历史上及文学传统中的“婚姻—民族”的隐喻象征意义，同时又融入了民族文化认同主题，现实族群差异往往被处理成跨族婚恋的阻力，隐含着作者对族际互动的文化主体性和平等地位的思考。总体来看，这些创作是对中华多民族间“分而不裂、融而未合”的文化亲缘关系的一种情感化、性别化重构，承载着“差异探索”与“文化融合”的双重话语规约，并结构在“凸显民族性”与“去民族性”的张力关系之中，显示出社会转型期多民族频繁交流引发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融合的双重思想驱动。

跨国族叙事不仅表现不同族群的跨地域行走、跨种族交往，还



想象了族群成员的跨国境遭遇和跨文化体验，是跨族与跨国的双重文体表意实践。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跨国族叙事具有明显族性特质，对跨国族的东洋人、西洋人、经济侵略和文化殖民等表现出明确的道德情感评价，在传统国家认同主题之上又建构了族群文化叙事，由捍卫国家民族尊严过渡到弘扬民族文化，从而使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得到双重强化。创作者尝试以超种族、跨国界的生命价值观及文化共性的文学建构来化解族际文化冲突，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意义和文学示范性。

蒙古族作家的民族认同突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独特魅力，成为打开民族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通道，北方游牧民族应对恶劣自然环境和动荡社会所沉淀下来的族性、永恒性、稳定性得到了高扬和强化。这是特定时期蒙古族文学的总体思想倾向，而常态往往是认同伴随着识别，一个作家或作品往往处在矛盾交织状态中，表现为民族认同的文化焦虑。阿云嘎既有《大漠歌》那样充满悲剧内涵的歌咏传统之作，也有《吉尔嘎勒和他的叔叔》那样称赞民族追求科技进步的作品。郭雪波的《大漠狼孩》一方面是对现代工业主义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大加挞伐，另一方面是对科技改变现状的美好遐想；一方面是对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精神的追寻与仪式化书写，另一方面又把宗教世俗化，定义为“迷信”并揶揄嘲讽。这可以理解为民族创作主体性自身的矛盾，既不能认同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又担心民族保守文化立场与守旧心态会使他们错失全球化语境中改造传统文化的历史机遇，是陷在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去族性与强化族性中的挣扎与徘徊。构建或重建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已经成为一个重大而迫切的文学乃至文化课题。

民族认同的文化立场具有双面性，它使民族文化得以在文学实践中保存和发扬，但也有可能使原来富有弹性的民族关系变得过分



清晰乃至变得僵硬，制约民族文化发展并阻塞民族文学的新鲜血液流通，生成蒙古族小说自身生存发展的危机。蒙古族小说的民族认同需要文化大视野和对民族文化的开放姿态，汉族、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及世界其他民族已经积累的丰厚文学文化资源都可资借鉴，应该融合一切优秀的文化因子在动态中完成民族化过程。另外要排除狭隘的文化等级意识和中心与边缘的成见，尤其对全球化与民族性关系方面要有前瞻性和辩证性认识，在一种互动思维模式中借助全球化手段推动民族性的全球传播，很多蒙古族作家在这方面已经探索并积累了一些经验、方法，成为民族文学创作的典范。

该书最后一部分探讨了蒙古族社会转型期的游牧美学变迁问题。在蒙古族社会步入国家性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时刻，蒙古族小说聚焦当代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心理，展现它“移动性”魅力与发展困扰相交织的文化特征。它不再简单沿袭把迁徙族群生存经验审美化的传统美学套路，而是表现出后游牧文化时代在多重维度、大文化视野和并不乐观的现实处境中思考民族文化复杂深沉的思想特征和审美内向化转变。在当代边缘和地方兴起的文化思潮中，复苏的民族生态伦理与文化哲学反思凝聚为一种新的游牧美学独特性，主导了新时期蒙古族小说创作。例如阿云嘎的《满巴扎仓》是聚焦民族医学进而探索民族哲学和审美思想的一部长篇力作，它溯源而上寻找民族文化的源头性价值观念和审美经验，强化蒙古族知识精英的智慧特征、戒贪念的道德伦理思想和草原民族崇尚力量的审美取向，表现出典型的传统游牧美学特征，但是又彰显出游牧美学的现代化转变，它所唤醒和表现的价值元素和现代文明建设形成了有机地对接和转化，在语言、地域、族群和文化体系方面具有明显的现代跨界意识。另外，尽管游牧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球性城市化进程中日渐衰微，但游牧美学却在城市中顽强生长并大放异彩，它



的生成折射了城市与游牧在空间范畴的矛盾性共生关系，并决定了镶嵌性、商业性和混杂性成为其存在的形态特征；它在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游牧社会民族认同不断强化所形成的文化再生产，但它并非被动地臣服于工业经济法则，而是拥有内在的审美主体性和能动性，并在城市规划、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领域发挥着独特的调适性作用。当代城市文化中的游牧元素反映了游牧美学的变迁轨迹和现代品格的生成。

本书力图综合以上思考，对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蒙古族小说创作中民族认同、文化思想及其游牧美学变迁等相关问题做一番梳理，以钩沉多元文化频繁交流、越界背景下，民族认同的多重蕴含与复杂状态，以及在文本中它与文化想象、文学审美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符号化过程。以期对新时期以来居于不同阶段、关注不同主题、坚持不同思想立场的蒙古族小说获得一个更加全面、丰富、深刻的认识，为振兴蒙古族文学创作及光大蒙古族文化提供一个研究框架和思想启示。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多民族文学影响下的蒙古族文学	1
一 时代文化诉求：现代化与民族化	1
二 新时期文学中的华夏边缘叙事	5
三 蒙古族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	10
第二节 现代化背景下蒙古族小说的民族认同	14
一 民族认同与现代化的悖论性相互依存关系	14
二 未完成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凸显	18
三 民族认同焦虑与自我化解	23
第三节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类型化	26
一 社会多元思想的映现	26
二 文化隐喻与结构性主题	30
三 族裔文学的生命力	33
第一章 重塑民族文化的现代品格	39
第一节 对现代知识与科技的认同	40
一 “知识分子气”与草原情结	40
二 代际冲突所隐含的现代倾向	46



三	充满时代局限的现代化认知	51
第二节	崛起的商业意识	55
一	空间、主业与财富	56
二	商业与爱情的相互烘托	61
三	商业人才的民族性与想象性	67
第三节	清理古老民族的旧观念	69
一	去除迷信的魔障	70
二	撼动传统的婚姻家庭观	76
三	新旧杂糅的特征	80
第二章	在断裂中发现传统的意义	84
第一节	典范化的族性精神	85
一	苍狼与白鹿的人格隐喻	85
二	浪漫纯洁的两性关系	93
三	生死考验中的大爱与尊严	97
第二节	民族性的坚守	102
一	传统断裂的痛感	103
二	机械主义对诗意生活的侵蚀	107
三	对外面世界的双重想象	112
四	草原对城市的救赎	116
第三节	反思民族现代化的经典之作：《燃烧的水》	121
一	侵入式与民族自发现代性	123
二	现代化的沉重代价	127
三	保留住不变的东西	133



第三章 诗意栖居与游牧之地	138
第一节 游牧文明生态思想的文学表述	139
一 返魅大自然	140
二 灵异的动物	145
三 拒绝机械主义的乌托邦	149
第二节 蒙古族生态小说中的科技想象	153
一 科技被异化的反思	154
二 本土化科技处理	158
三 杂糅式想象	162
第三节 郭雪波小说中的魔幻与现实	165
一 神奇的科尔沁沙地	166
二 族裔文化与生态主题	170
三 魔幻传统：汲取与反哺	174
第四章 跨族叙事与文化想象	178
第一节 族际通婚的多重含义	178
一 族际通婚的文化意义	178
二 男欢女爱中的民族认同	181
三 族际通婚的阻力和障碍	185
第二节 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手足情深	191
一 拟血缘的叙事策略	192
二 多民族文化互动与本民族认同	196
三 “人在他族”的想象	202
第三节 国族观念下的“异族”书写	205
一 “外国人”所隐喻的民族尊严	205
二 “洋人”与民族文化差异	210
三 超越种族与国界的共性	214



第五章 蒙古族社会转型与游牧美学的变迁	219
第一节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与游牧美学嬗变	220
一 传统游牧文化为思想根基	220
二 后游牧社会文学审美的“内向化”转变	224
三 新时期游牧美学的独特性	227
第二节 阿云嘎的《满巴扎仓》与游牧美学	231
一 从蒙医药学到游牧民族文化思想的提升	232
二 游牧美学与民族性格密码	235
三 融合多元为一体的游牧美学	239
第三节 当代城市文化中的游牧美学	243
一 作为理论模式和文化实践的游牧思想	243
二 游牧与城市的矛盾性共生关系	246
三 文化再生产中的民族认同与他者观照	249
结语 蒙古族小说的当代意义	253
参考文献	259
后 记	263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多民族文学影响下的蒙古族文学

一 时代文化诉求：现代化与民族化

新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接续一度中断的启蒙传统，再次启动文化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则是其核心和灵魂。”^① 现代化概念虽然从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传播，但其所指涉的进程早在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就已经向世界扩展。中国现代化进程在近代外国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经常谈论的“西化”与“欧化”指的就是“现代化”。新时期现代化问题再次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并成为焦点问题，是因为此前的二三十年

^① 周三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中国大陆在文化上处于‘逆水行舟’的状态”^①，知识分子迫切感到“再启蒙”的必要。“文革”十年毁灭性的灾难使知识分子对集权主义和文化专制制度心有余悸，为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对“文化政治同构”的政治伦理型传统文化进行清算，因为它强化了对皇权政治秩序的认同，但却严重阻碍现代性的生长。同时，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改革的单方面推进，也使人们看到了经济迅猛增长背后的文化症结，“受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支配的中国民众在基本素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还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经验式和人情化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模式常常阻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②。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尽管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诸多范畴还存在争议，但“文化现代化”却成为最强烈的时代诉求。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以昂扬激进的姿态表达了他们对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设想。与“五四”如出一辙的是，知识分子依然是从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入手，如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的哲学观点，托勒夫、莱斯比特的未来主义，汤因比的历史学观念，韦伯的社会学观点，亨廷顿的政治学。引领思想潮流的有《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两套丛书引发了全国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标志着思想文化界已从“文革”的文化封闭状态中走出来。此外，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启蒙杂志之一《读书》曾发表一系列文章，积极倡导文化现代化的大讨论。1980年第11期刊出了《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的文章，作者态度激烈地喊道：“负着传统文化的沉重枷锁，中华民族将永无振兴之时。”^③ 1986年《读书》第2期发表甘阳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传统、时间性与未来》，甘阳

①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37页。

② 同上书，第201页。

③ 林春、李银河：《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读书》1980年第11期。



对“传统”做出了新的解释，“把‘传统’等同于‘过去’，就必然会以牺牲‘现在’为代价”，“‘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这就是说，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或说‘可能世界’”。因而，“‘继承发扬传统’就绝不仅仅只是复制‘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恰恰是要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创造出‘过去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从我们今日来说，就是要创造出过去的中国人不曾有过的新的现代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所谓‘批判地继承’，也就并不只是在‘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中挑挑拣拣，而是要对它们的整体进行根本的改造，彻底的重建”^①。最后作者还富有煽动性地发出召唤：“中国的现代化今日已经真正迈开了它的步伐，有幸生活于这样一个能够亲手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历史年代，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② 作者面向现代、未来的彻底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和飞扬凌厉的气势堪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闯将。激情飞扬的年轻人是如此，即使是满腹经纶、国学功底深厚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也都肯定“五四”的文化方向，鼎力支持新时期的文化现代化，余英时曾说：“今天重新肯定‘五四’在文化方向上的正确性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五四时代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冲击诚然失之过激，这是不必讳言的，这种激烈的态度也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特色。”^③ 他说一方面应该肯定“五四”，一方面还要超越“五四”，这超越就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真正了解基础上的现代转

① 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② 同上。

③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36页。